

上次去台北，一到大名鼎鼎的西门町，我便问向导附近可有当年铁路的旧迹，向导不知。我问他可知道杨唤，他懵然摇头，我又说，据说台湾中学生课本里有他的诗，还是某册的首篇，名为《夏夜》，他立刻恍然大悟，连声说“有印象”。

那是一首儿童诗，恬静美好，亦充满童趣，极适合放在课本中。杨唤是一位诗人，未满20岁便以诗成名，却于24岁时辞世，只留下二十余首儿童诗。1980年，《布谷鸟》诗刊设立杨唤儿童诗奖，1988年，“杨唤儿童文学奖”成立，每年颁奖一次，那是惠及两岸儿童文学作家的奖项。

我之所以问及西门町的铁路遗迹，是因为那是杨唤意外去世的地方。据载，1954年3月7日，有雨，他在台北路遇同事，得赠电影《安徒生传》的劳军票，而安徒生恰恰是他的偶像，若非囊中羞涩，他早已自己购票，于是，他匆匆跑向西门町电影院，穿越铁路时，竟不慎把脚夹在两条铁轨的缝隙中，而列车却随之呼啸而来……

如今站在西门町的喧闹街头，入眼只有一派繁华，不见当年风貌，更不会有关于杨唤的蛛丝马迹——即使在当年悲剧发生时，也乏人关心杨唤的命运，因为他只是个卑微潦倒的青年。他的一生实在太过短暂与贫苦，1930年出生，1947年到青岛工作，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至台湾，1954年意外去世。

如今能寻得的杨唤遗迹，

【故人旧居】

□叶克飞

孩子也有他们的鉴赏力 儿童诗人杨唤：

也许唯有他在青岛的故居。

那是我外婆家附近的青岛观海一路4号。在我印象中，这里永远是静谧的，想来是因为交通不便的缘故，因为此路环绕观海山，小路间彼此石阶相连，只有一个路口可通车，便少了喧闹。

沿石阶走上观海一路，宛若走进欧洲小镇，一栋栋德式小楼自顾自地残旧着，院子里总有茂密树丛和绚烂的花。这一带总有着一种破败的美，我少时无从察觉，可多年后，一个人站在这条街上感受这宁静，那破败便扑面而来。路口右边的一栋平平无奇的斜顶红瓦建筑便是观海一路4号，探访那天，房顶的红瓦边沿顽强地生出一束紫色小花。

那顽强，一如杨唤本人。

杨唤一生坎坷，颠沛流离。他不满周岁母亲便病逝，两年后，对他极好的祖父母也相继去世；父亲再娶，可后母一直虐待杨唤。1947年，17岁的杨唤从农校毕业，同年父亲病故，他无法留在家中，只能四处流浪，先是到天津投奔亲戚，因寄人篱下而饱受白眼，然后前往青岛，在《青报》找了份校对工作。不久，副刊编辑因病休假，他临时顶班，却表现出色，结果成功转正。据友人回忆，杨唤认为在青岛那段时间是自己最快乐的时光，那时报社恰好补发薪水，他立刻买了两大竹箱的文学名著。他也结识了不少作家，并尝试自己写诗写文，第一本诗集《乌拉草》便在青岛结集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当时中国兵荒马乱，他连工作都保不住，不久《青报》关门，他又流浪至厦门，迫于生计，进入一支国民党军队当电影放映兵，1949年春随军去了台湾。

在台湾，他找到了自己的梦想，1952年，他开始在报纸上发表儿童诗。

我曾认为，特别幸运的人与特别不幸的人都会有纯真童心，杨唤属于后者。他早年在大陆时创作抒情诗，赴台后专注于儿童诗，前者是忧郁的表达，后者却欢畅温暖。少时的悲惨生活让他愤懑，却也让他无比憧憬甜美的童年，“我笑我那凄凉的童年，我笑我那童年里的苦难，虽然我笑得很凄然”。

他写儿童诗，友人并不支持，认为以他的才气应写

更“高级”的东西，杨唤则说：“儿童文艺在中国是最弱的一环，虽然目前儿童读物多如春笋，严格地说来又有几种合格的呢！较之英、美、日本，可谓少得可怜又可怜。我不敢说我的儿童诗写得怎么好，但是在这里就没有人肯花工夫去给孩子们写东西，你想，一般成了名或出了名的，或不成名的也不出名的都想用大块文章去换得奖金，有谁肯花大半天的力气，去换两包香烟钱呢……你知道，群众是最好的考验，孩子也有他们的鉴赏力。”

他的儿童诗，如今读来亦是优美动人，童真总被唤起。那些童年遭受的艰难困顿，似乎更激发了杨唤的爱与真挚，就如研究杨唤的学者所说，“他在长期呐喊、内心孤独的生活中，却能以丰富的情感驰骋于无涯的联想领域，用纯美语言，酿成当时特有的天真儿语，实在堪称一绝”。他的儿童诗并非只是写给孩子看，也写给自己看，那些美丽幻想，那些童话情境，都是他梦中期盼，比如故乡的“月光，银色的海，蓝色的海，美丽的美人鱼，美丽的星子，红红的灯笼，红红的珊瑚……”世间万物，都成了他诗中素材，再以拟人修辞表达，尽是童趣。

当然，也有怅惘——在他不写儿童诗的时候。比如他写《乡愁》，便是我爱的腔调，尤其是那句“站在神经错乱的街头，我不知道该走向哪里”。

可惜，这个世界给他的时间委实太少。

【齐鲁英烈】

张晶麟： 胶东“刘胡兰”

□陶遵臣

刘胡兰是已知的中国共产党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。其实，1941年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就出现过一位刘胡兰式的少女英雄：烈士张晶麟。张晶麟的一生仅有短短15年，但她用短暂的生命谱写了一曲英雄赞歌。

张晶麟1926年出生于荣成县俚岛区青安屯村（现辖属寻山街道）一户贫苦农民家庭，是个可怜的遗腹女。母亲靠着耕种村北一亩薄地和给本村小学教员做饭维持生计。张晶麟10岁那年，村里办起了女子半日制学校。张晶麟被母亲送进学校，她上学非常勤奋，学习成绩优良。在学校里，老师讲起岳飞、文天祥等历史人物的爱国故事，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爱与恨的种子……

1938年，青安屯村张华丰兄弟3人以开小酒店作掩护，建起了党的地下联络站。因为群众基础好，村里1940年成立了抗日救亡组织，被称为“小苏区”。

1940年2月，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了张晶麟的家乡，经常来烧杀抢掠。目睹乡亲们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，张晶麟找到村里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张之诚，强烈要求加入了村妇救会。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，她很快懂得了革命的道理，积极从事抗日宣传，站岗放哨，工作十分投入。

1941年4月初，经张之诚推荐，中共俚岛区委决定调张晶麟到峨石乡担任自卫团团部干事。张晶麟到峨石乡工作后，这里的环境十分恶劣，但她无所畏惧，总是没日没夜地走村串户，检查岗哨，组织妇女识字班，教少年儿童唱革命歌曲，不知疲倦地工作着。

横贯胶东半岛的伟德山支脉大恒山，是荣成县伟德山区、荣山区及俚岛区的制高点 and 交通要道。大恒山南山腰有座虎础寺，山后则是险要的关隘李华口，乃是威海通往俚岛的咽喉，地势十分险要。日伪军一直想利用这座古寺安设据点，以切断荣成中部各区之间以及与威海的联络。

敌人的阴谋被荣成县委及时识破。峨石乡委接到县委指示后，决定组织附近群众拆除虎础寺。张晶麟连夜和其他几名同志分头到沟陈家、山后、桥子沟、柯家口、初家泊等村庄发动群众，约好农历七月二十七齐聚虎础寺。

不幸的事情发生了。由于汉奸告密，俚岛据点的日伪军得到拆寺的消息后，立即派来了人马，气势汹汹地包围了虎础寺。日伪军一边喊“捉拿共产党”，一边开枪射击。听到枪声，拆寺的群众慌乱起来，四处奔跑，情况十分危急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张晶麟沉着地对战友小黄说，“我年龄小，目标也小，你赶紧带领群众突围。”她边说边指挥群众疏散突围。最后大家安全脱险，张晶麟却落入了魔掌。

张晶麟被捕后，敌人立即将她押往俚岛据点。穿过俚岛街时，两旁挤满了人。张晶麟像一位出征的壮士一样，脸上毫无惧色。提审过程中，张晶麟被打得遍体鳞伤，几度昏厥。敌人的残暴令人发指，但是，张晶麟并没有屈服，反而更激发了她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勇气。

张晶麟被捕后，区委、乡委的领导和同志们心急如焚，多次设法营救，但皆因敌人戒备森严未能成功。

八月初一凌晨，黔驴技穷的日伪军将张晶麟押到了俚岛东烟墩山坡上。张晶麟知道自己最后的时刻到来了，面对刽子手举起的屠刀，张晶麟高呼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这惊天动地的口号，令刽子手们胆战心惊……残暴的敌人对张晶麟举起了屠刀，并凶残地将她的头颅挂在村里示众。

由于当时的胶东抗日根据地被敌占区所分割，张晶麟的事迹未能被党的新闻媒体及时宣传；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张晶麟当年的战友有的牺牲，有的随部队转战到全国各地，致使这位刘胡兰式少女英雄的事迹被“尘封”多年。但是当地人民从来没有忘记过张晶麟，她的英雄事迹在当地口口相传，流传至今。

【老照片】

怀念蓬中生活

□蔡斌

我现在住在枣庄，88岁了。因为缝了3600多双棉布鞋垫给部队官兵，大伙儿都叫我“鞋垫妈妈”。我珍藏着一张老照片，虽然有些模糊，但跟它有关的许多记忆，却是无比清晰，怎么也会忘不掉。

1941年，那时的蓬中是蓬莱县唯一的中学，是八路军创办的半工半读学校，也是我们这些青年人想参加八路军的桥梁。

学校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里，老师和同学都分散住在老家乡，我和几位同学住在一个有钱人家的粮库里。大家上山开荒种菜，因为是石头地，种的小白菜只长几个叶，主食是苞米饼子，还有地瓜干。生活虽然艰苦，但同学们每天有序地听课、唱歌、排练节目，《南泥湾》这首歌就是那时候学的，我们排练的节目就有庆祝孟良崮战役大捷的。

有一次学校安排我去二刘家学校开会，我认识了八路军派到村里工作的刘进同志，他送给我几本八路军印的宣传小册子，还有一本论联合政府的书，那时我就梦想着去当八路军。有一次听过团课后，团组织委员找我谈话，问我想不想入团，我说，愿意。他又问我入团想干什么，我干脆地回答，去当八路军。他说是为人民服务。真好，这句话真好，当八路军就是为人民服务。

1947年7月，国民党重点进攻胶东，学校被迫暂时疏散，10月份南迁至四十里外的四甲复课，我们一晚上走了四十多里路，大家抬、扛、提，到了四甲时，天已经蒙蒙亮。女生集体住在一个临街房子里，地上铺着麦草，中间放一根木头，大家头对头睡，每个宿舍发一盏豆油灯，每天早晨起床后都从井里提水洗脸，因为是冬天，女生们洗完脸后，脸两旁的头发都冻成了小冰棍。

战争年代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上级又通知学校停办，我当八路军的梦想要落空了，我哭了两天，学校老师告诉我，有机会一定通知你。1948年3月份，学校通知我和顾云芳（女）等准备去抗大，然后我就在村里参加民兵训练，学习埋地雷，地雷有板雷、钉子雷、管雷和绊雷等。到了5月份，我和同学顾云芳、蔡斌、金德生终于一起去参军了。（图片摄于1948年9月青州，从左至右顾云芳、作者、蔡斌）



夏日能使记忆的闸门洞开，从浸出的汗液里，透出童年、少年与那几种与生命相关联的植物来。

老家最早喜种高粱，春秋秋收，红红的高粱米，可烙煎饼、蒸馒头、蒸酒。在狭长的圩田内，粼粼的湖面上，时时能听到渔家“吱吱”地摇桨声。瓜田李下，柳树蝉鸣，太阳底下的瓜农，不失时机地翻晒着西瓜的另一面。成熟的高粱被大人砍回家，忙着给嗷嗷待哺的孩儿饕餮一顿。高粱穗轴去掉颗粒，可以扎扫把、笤帚；秸叶可喂牲口。很多时候大人收获要在水里进行，夏末秋初雨水多了，水水砍高粱的事再正常不过了。

后来大面积种植玉米，其间也试种过水稻，都是为

【旧时光】

□山歌

高粱、水稻与红麻

了替代高粱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某一天，我经历过一次村里的水稻栽培。邻村有个提水站，可

浇方圆五里地。畦田一放水，生产队长一阵叫喊，村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大人插秧，少年耨秧苗。这时，微风吹拂动社员们的心坎，新鲜有趣的活儿，大家努力把把稻苗插好。本族衍好叔和我是初中同学，麦假期间俺俩头一次跟着大人学干活。下午一两点钟，送茶水和饭赶来。“生产队管吃”，这对于习惯每天二顿饭的村民来说，是极好的事情。有人提出分给大人三张饼，少年则一张。当时我不知怎地暗自掉泪，力没少出，饭比大人少一倍多，心里颇不平衡。衍好叔对我说：“道民，咱家走，不干了！”

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”，名句到了江北就没

了质感，几次栽种的水稻都因土壤漏水、产量低，再也种不了。

本地种植红麻的历史不算长，但是它棵高、浓密且粗壮。处暑正是收获季节，生产队把收割过的红麻放到河边或大坑中沤泡，到立冬前后捞上来，剥开晒干能拧绳。牲口拉车、东西捆绑都离不开绳子。但是沤红麻得用许多烂泥覆盖上面，或者用石头压住，好让它泡在水里。相比种植历史悠久的苕麻、苘麻，从国外引进的红麻既高产又适宜，一时间种植红麻如火如荼。社员和学生们一起劳动，收割红麻的场面不亚于集体收小麦。

如今高粱、水稻、红麻，在我们老家都很少见了。